

# 建构中国外交的“和力”

□ 吴心伯

〔关键词〕 中国外交、和力、和合

〔提 要〕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为了树立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外交范式，引领新的世界秩序，需要建构中国外交的“和力”。“和力”就是基于“和合”的理念，通过正向运用一国的综合实力，以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和谐”、“合作”的能力。本文具体探讨了“和力”的理念和观念支撑，分析其构成要素和运用方式，并对其特征进行总结。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13) 2 期 0114-08

〔完稿日期〕 2013 年 2 月 28 日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力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力的研究产生了近代物理学，而对人类社会的力（力量和权力）的研究则催生了国际政治学。物理学对自然界的力的研究聚焦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但国际政治学在研究“力量”或“权力”时，主要关心其大小和性质（如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或硬实力、软实力等），而较少关心其作用方向。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力量或权力的作用方向不重要呢？当然不是。通常在对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者进行分析时，我们既要考虑其能力，又要考虑其意图，

因为意图关系到行为者如何运用其能力，也就是力量或权力的作用方向，它关系到该行为者是带来合作还是冲突，是促进稳定还是削弱稳定，等等。本文所讨论的“和力”，<sup>[1]</sup>涉及的就是力量或权力的运用方式问题。

### 一、建构“和力”的时代背景

提出建构中国的“和力”，是基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缘政治位置重要，兼之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必然是重大而全面的，它带来的将是国际力量结构和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为了让世界准确认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向世人阐明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运用其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二是如何建构新的世界秩序，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联系的。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大国或强国对力量的运用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古代中国对外注重发挥“文明”的力量，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获得影响力，并根据外部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接纳程度来建构彼此的关系，从而形成特定的地区秩序（即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鉴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再照搬这一模式。第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获得巨大的物质实力后，对外滥用“硬实力”，推行武力扩张和征服，掠夺和瓜分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导致战火不断，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登峰造极，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中国是近代列强侵略扩张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坚决拒绝这一模式。第三，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后，既注重硬实力，谋求和保持超强军事实力，频频对外用兵；同时注重软实力，积极扩大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软硬兼施。不

---

[1]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先后提出“和力”、“和实力”的概念，如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发展需要有‘和力’”，“‘和力’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思想、战略和能力在和善、和平与和谐中得以展现，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与世界各国发展相融合的发展，进而得到世界的认同和欢迎，最终在中国和世界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复旦发展研究院，《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2011年11月，第72页。再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则提出，要“在全球化语境中谱写和演奏中华新的‘和实力’乐章”，认为“‘和实力’将调整世界的诸多冲突和危机。和处为美，和立为真，和达为善，化干戈为玉帛，化对抗为对话。化冲突为融合，化动乱为安定，化战争为和平”。张立文：“中国文化创新的思议”，《学术前沿》，2012年6月下，第69页。但上述研究没有对“和力”或“和实力”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对“和力”或“和实力”的表现方式也缺乏论述。

管是运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抑或软硬兼施,目的都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因而常常造成践踏他国利益、破坏世界和平与公正的消极后果。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国来说,这种模式也不可取。尽管奥巴马政府鉴于小布什政府滥用硬实力的教训,提出“巧实力”的概念,主张面对具体情况,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这实际上指的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运用要得当,因此“巧实力”并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形式,也没有超出传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范畴,而只是一种力量使用的策略,对中国的参考价值有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崛起,必须提出新的力量概念,倡导新的力量运用方式,以超越近代以来新兴大国片面追求和滥用硬实力优势的窠臼,塑造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国际形象,构建新的外交范式。<sup>[1]</sup>正如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最近所指出,“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引领世界的大国,中国需要提出自己的理想、理念,以及价值观”。<sup>[2]</sup>

另一方面,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带来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因此人们关心的是新兴大国追求什么样的秩序以及如何构建这种秩序。21世纪初,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也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世界秩序愿景,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人类未来的严肃思考,但如何将“和平崛起”的理念付诸实践以推动“和谐世界”秩序的构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建构和弘扬其外交上的“和力”,以推动共同发展、积极维护和平、有效化解矛盾、和平解决冲突、促进共同利益、推动人类进步,从而使“和谐世界”的秩序构建成为可能。

## 二、“和力”的理念和观念支撑

与传统的力量分类和界定不同,“和力”不仅仅指力量(硬实力和软实力)本身,更包括对这些力量的指向性运用,也就是力量的使用方式。如果

---

[1] 关于“新兴大国”与“新型大国”的区别,参见吴心伯:“国际形势剧变下中国的国际取向”,《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23页。

[2] 宫本雄二:“仁、包容与中国外交”,《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1月8日,第19版。

要做一定义的话，“和力”就是基于“和合”的理念，通过正向运用一国的综合实力，以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和谐”、“合作”的能力。“和力”因而具有三要素，即理念、力量构成和运用方式。

“和力”理念的核心元素是“和合”，“和合”既是一种哲学理念，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在哲学意义上，“和合”强调的是事物的相互协调和互补，在价值观意义上，“和合”指“和平”、“和睦”、“和谐”、“融合”、“合作”。

“和力”的观念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的底蕴，<sup>[1]</sup>也来自对过去30年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宗旨的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既基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思考（不能走对外使用武力和侵略扩张的老路），也来自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加深）。<sup>[2]</sup>实际上，当下三个最主要的命题催生了“和力”的观念，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该如何谋求国家利益？怎样处理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就构成了支撑“和力”的世界观、利益观和矛盾观。

“和力”植根于这样的世界观：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促使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全球性挑战成为世界的主要威胁，人类共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应对；世界多极化进程发展加快，新兴力量的兴起突破传统的国际权力格局和治理格局，需要重塑国际关系规范。在此背景下，人类应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来推动建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sup>[3]</sup>

---

[1] 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写道，“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这个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q/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http://www.gov.cn/jrzq/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中国政法大学的林存光教授指出，“将中华民族称之为是一个崇尚和谐古老民族，而且其‘和谐’理念也自有其自身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民族特色，这一点大概是毋庸置疑、也是世所公认的。”林存光：“中国古典‘和谐’理念及其政治含义论析”，《学术前沿》2012年7月下，第61页。

[2]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3]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谋求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而所采取的手段的不同也导致了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等不同的结果。“和力”所依托的利益观具有与以往的国家利益观所不同的理念。首先是讲究利益的共赢。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条件下,各国的利益相互交融,因此不能以零和思维看待国家间的关系,而要以合作双赢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的实现,惟其如此,国家间才会进入良性互动,这从根本上确保了一国利益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是强调共同利益。在建构利益共同体的时代,各国不应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更应齐心协力把共同利益这块蛋糕做大,这样才有助于放大一国的利益总量。第三是遵守利益均衡原则。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其核心利益和正当利益,国际社会成员应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照顾对方的正当利益,而非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惟其如此,才能建立国家间互信,合作才有可能。

矛盾(包括分歧、争端、冲突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如何解决矛盾一直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考验,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化状态。“和力”所依托的矛盾观提倡以21世纪的方式处理分歧和争端。首先,它主张以对话、协商、谈判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以和平而非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武力的使用不可避免,这种使用必须是有限的和适度的,是为了推动最终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其次,它主张对问题的解决要顺其自然,在解决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时要搁置争议,等条件成熟再做处理。此外,它还主张以包容的态度解决分歧。解决矛盾的上策不是追求完胜,而是找到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点,这就需要有妥协和包容的心态,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

### 三、“和力”的构成要素及其运用方式

“和力”的构成具有综合性特征,它包括了经济、外交、文化、安全、国际政治诸要素,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力量要素又与其特定的运用方式相联系。

“和力”的经济要素及其运用。“和力”的经济要素表现为与外部的经济互动,这种互动顺应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大趋势,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健康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机制与规则,

推动平等、互利、务实的地区经济合作。<sup>[1]</sup> 对外经济交往谋求互利共赢，而不是谋求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对外援助致力于促进他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作为影响他国内部事务、获取对他国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和力”的外交要素及其运用。“和力”的外交要素是与外国讲信修睦，扩大国家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在国家间的互动中，诚信为本，切忌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或挑拨离间，栽赃诬陷。当两国间出现分歧时，外交的功能主要是说服和谈判，而非施压和威胁。外交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是对他国实施政治控制的手段。同时，在全球化和利益相互依存的时代，当一国内部发生冲突和动荡时，外交也应为了该国之和平与稳定而发挥劝和促稳的功能。

“和力”的文化要素及其运用。“和力”的文化要素是文化交流。全球化便利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但也容易导致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弱势文化的萎缩，而“和力”主张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为了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and 理解，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来提升自身文化的品质。文化互动既追求文化的时代性，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多元多彩的文化比单一的文化更有益于人类的精神需求。不利用文化交流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谋求文化霸权。

“和力”的安全要素及其运用。“和力”谋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和结盟安全，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不是动辄武力相向。“和力”对军事力量的基本态度是：不反对一国发展适度的国防力量，但反对过分谋求军事优势的做法；不反对使用军事力量，但主张军事力量的运用应仅限于维护核心利益（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卫（如反侵略、保护境内外正当利益免遭威胁）以及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维和、救灾、保护航行自由、人道主义干预等），而不是用来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或对他国搞政权更迭。

“和力”的国际政治要素及其运用。“和力”的国际政治要素是指中国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包括提出进步的理念、设置行动议程、提供公共物品、推动国际合作等等。随着综

[1]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联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已经并将更多地,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这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表现,但中国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领导,不谋求垄断世界事务的领导权,而是主张集体领导,即相关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合作处理世界事务。同时,中国重视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发挥国际作用,以国际机制为平台,以国际规范为准则,并随着形势的变化改革现有机制,创建新的机制,合理地调整和修改游戏规则。

#### 四、“和力”的特征

第一是独特性和创造性。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和谐文化传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大国,中国提出“和力”的观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和独特的中国智慧。同时,以理念、力量和运用方式为三要素的“和力”观突破了传统的力量分类(如政治、经济、军事之分,或硬实力、软实力之分),并将对力量的关注从大小和性质转向运用方式,这一创造性的思维不仅更新了对力量的理解,丰富了力量的内涵,更深化了对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认识与思考。

第二是价值取向与政策理念和实践的一致性。如前所述,“和力”所弘扬的价值包括“和平”、“和睦”、“和谐”、“融合”、“合作”等;“和力”所秉持的政策理念是和平为贵、合作为上;和而不同、平等相处;利益均衡、进退有度;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等等。征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实践,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到21世纪初则提倡“和平、发展、合作”,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又践行了“和平、发展、合作、责任”的宗旨,恰好吻合了“和力”的上述价值取向和政策理念,表明“和力”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

第三是包容性和共生性。在近代以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强调力量均势和优势,谋求其价值观的一统性,对力量(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运用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往往导致对抗和冲突。“和力”则不然,其价值取向和政策理念倡导“和平”、“和谐”、“和而不同”、“利益均衡”等,体现了包容性和共生性。

第四是鲜明的时代性。“和力”的概念反映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需要。国家间利益相互依存的加深呼唤着合作共赢，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增加需要各国合力应对，国际社会思想理念、行为规范的演进更使“和平”、“和谐”、“合作”成为主流价值，在此背景下，“和力”的概念应运而生，鲜明地诠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第五是很强的针对性。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世界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对外运用其力量优势。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对外武力扩张的良好意图，还不足以打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只有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中国将如何对外使用力量，这种力量运用方式与历史上的诸多大国对外使用力量的方式有何不同，才能真正回应外部的关切。

中国积极地构建和弘扬外交上的“和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和力”观体现了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新型大国的决心，有助于塑造中国更加积极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和力”的进步理念有助于推动以新的、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当然，“和力”的构建也会面临诸多的挑战。首先是中国能否保持良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态势，能否有效克服来自外部的各种制约，能否妥善应对外部的各种挑战。其次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尤其是美国）是否能够积极呼应中国提出的进步理念，是否愿意与中国一道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的进化。

责任编辑：李静